

“标题党”的风行,在于网络,也在于纸媒,已经引起国民的厌倦——据中国青年报近日对31个省市区的11394名读者的调查,78.4%的人们认为,“当前媒体中有耸人听闻式标题的新闻普遍存在”。

“标题党”不是什么新品种,只不过于今尤烈,一时流行而已——“标题党”以点蔽面,将个别之例放大为普遍现象,以求得“振聋发聩”的卖座,比如赫然大标题“内地人流手者半数未成年”,其实只是一家医院在一段时间内的统计,结果“放大”成普天之下,莫非如此,成了一个“全国性”的“事实”。“标题党”起意突兀、故作荒诞,例如大标题“江苏质评为猪建‘别墅’”,称猪心情好肉质才好,其实所谓“别墅”,不过是循环生态的猪圈而已,结果平常一事,竟激起舆论哗然,也“收到了媒体的预期效应”。“标题党”故玩“概念”,善贴“标签”,例如《两名中国留学生在洛杉矶被枪杀死于宝马车内》,因为一个“宝马”的“符号”,居然也引出人言汹汹,万千猜测。“标题党”甚至无中生有、空穴来风……

说“标题党”耸人听闻,算是说对了它的心态和“追求”。在“标题党”看来,生活还过于平淡、不够激烈,事实还过于骨感、不够惊悚,对比也欠缺反差,不够突兀,而新闻本身,更过于“平铺直叙”,远远不够“跌宕起伏”。于是“事不够、标题

凑”,于是甩开膀子来“做标题”——谁让这个“速读时代”,相当多的人们“看看书皮、读读标题”,没有多少时间来看你的“新闻”本身,更没有多少兴趣来探究真相、辨析真伪呢?其实真要“耸人听闻”,单靠“标

从“标题党”到“酷评家”

司马心

“标题党”是不够的,于是便有了“酷评家”——评家蜂起,风至云涌,本似言路大开的好气象,然而“评”之一“酷”,过犹不及,恐怕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比如“酷评家”与“标题党”的联手,凡有耸人标题一出,即有“酷评”随之呼应、高举高打,放话之狠、言辞之烈、其势之猛,几令人瞠目。就如《为猪建“别墅”》,这边标题甫出,那边“酷评”便四起,说现在很多人还没有房子可以安居,为什么“猪”倒先有了“别墅”?还有质询是猪“心情好”还是“领导政绩好”的,断定这是一个“政绩工程”,是当地领导为了“要乌纱”而故意作秀!本来作为比喻的“别墅”,经“酷评家”闭眼一咬牙,竟成了一个“政治问题”。

“酷评家”一日数文,广为投贴,虽然多产,却只见一个不变的“套路”。比如一个新人出来,先说他“二代”,再来宣称他的“背景”和“猫腻”;又比如一事当先,先说你“作

秀”,再断定你为了“一顶官帽”;再比如一策出台,先说你“政绩工程”,再反问“其中难道没有好处可以捞么”?这一点“公民意识”自然十分可爱,但即使是一种本来颇有道理的思维方式,如果变成一个“凡是”的定势,一种简单化的“形而上学”,一句莫不如是,概莫能外的“言必称”,那也不免令人叹息——实事求是的“分析好”,才是思想的精神与厚道,而平等平实的“平心而论”,才是批评的成熟和水平哦。

“酷评家”一见“标题”,立马就要放言,而且还要“足尺放三”,哪里会去核实一下事实的真伪——且不说那些所谓的“事实”正中他的下怀,正合他预设的“逻辑”呢!所以诸多的“酷评”,多会发生事实失真的问题,有如在建于沙滩的房子上再来叠床架屋,借以评论的素材本身就要打问号,基之无存,还谈什么评论的公正性和说理性?然而往往有这样的“酷评家”,即便事实已经澄清、谣言已经破灭,他却仍不认错,甚至一点尴尬也没有,说这件事是没有,但这样的事,在别处、在“生活”中难道没有吗?甚至还有为自己或他人的“信谣”甚至“造谣”而辩解的,说为什么“人们”这么容易相信谣言,难道不是因为谣言也有“社会存在的根据”么?所以他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哪里会去接受一点“乌龙”的教训呢,更不会给自己身上那一点“国民性”以些许“酷评”了。

说过了俞国良,再说一个俞国良的徒弟。

蜀山下的南街曲曲弯弯。巷弄里冷不丁走出一个人,蓬头垢面,衣著邋遢,神情愚钝,阔脸上一道亮疤,端的是副背时之相。爷们千万别小看他,你看他步履稳稳、衣袖宽宽,举手投足,自有一份常人不易察觉的清朗之气。那飘拂衣袖里说不定藏着宝贝呢,什么宝贝?说时迟,那时快,袖中便掏出一把壶来,口中念念有词:宝珍之壶,只知己不卖财主!

居然有人哄抢。壶,只有一把,银圆二块,要买趁早!没得到壶的人叹道:宝珍之壶,就这么难求吗?这里说的,不是水浒传里的某个章节。李宝珍,俞国良的高徒,生下来就是个做壶的艺人。晚清光绪到民国前期,蜀山下的南街,这一带的人,不是做壶的,就是烧窑的,宝珍家几代做壶,越做越穷,于是他这辈子也只能做壶,只配做壶。

据说俞国良很赏识李宝珍。满师的时候,俞国良

特意给李宝珍做了一套制壶的工具,这是他对徒弟最高的赏赐了。某一日,俞国良将宝珍唤到跟前,说有一个机会,去山西,给阎长官制壶。李宝珍脑子里嗡地一响,乖乖!他这辈子连县长也没见过,阎锡山可是山西的皇帝呀!宝珍向师傅保证,一定不辱使命,好好干!

去山西的紫砂艺人计

壶颈长夜

——读史记之二十二
徐风

有:李宝珍、杨阿时、吴云根。后来宝珍才知道,阎锡山并不是单请他们为个人制壶,而是邀请他们去山西的平定县创办平民陶器厂。

那山西平定县,位于太行山右中段,地处冲要,素为兵家必争之地。李宝珍们到了平定,大展身手,一面建陶器厂,一面带徒弟,名声日隆自不必说。李宝珍年轻,精力充沛,一个人可以干两个人的活。老板非常赏识他,自然赏金也多。李宝珍给家里写信,说自己天天吃萝卜干,为的是存钱,将来造房子娶媳妇。三年下来,李宝珍的腰包里很攒了一笔钱。后来,房子真的造起来了,就在蜀山南街的后巷,三间平房,是当时一个壶工非常奢侈的宅第了。有了房子,老婆也要回来了。李宝珍很满足。

李宝珍的风头出在1933年。当时的江苏省主席陈果夫刚刚上任,很想在江苏这块宝地上有所作为。他喜欢陶瓷,令让宜兴的陶瓷师傅去苏州兴办陶器厂。李宝珍被选上,这在当时是件很荣耀的事。苏州多金主,有钱的茶客也多,李宝珍的壶一度非常抢手。订单多的时候,他亦不肯做粗货,壶艺的讲究,一如他的国良师傅。但凡那窑里有他的壶,便会

有客户在窑口守候,他们早已付了定金,壶刚出窑,壶体还烫手,就被人取走。当时的茶壶市场讲究口碑,像李宝珍这样的壶手,客户们耳熟能详、口口相传的代表作就有“传炉壶”,还有“葵仿古”、“圆条壶”、“犀登壶”等。最抢手的“云龙壶”,因其壶体上游龙与云纹栩栩如生,暗合着中国人心底深处的龙腾崇拜,广得藏家茶客青睐。

凭着一双手,一坨泥,李宝珍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得让神仙都羡慕。可是抗战

一爆发,紫砂市场即一落千丈。所有的龙窑都不冒烟了,壶手和窑工们纷纷改行。平时趋之若鹜的壶迷和收藏家亦作鸟兽散。李宝珍的壶做得再好,也没人光顾。日本人在出紫砂泥的黄龙山上修筑了炮楼。一日,李宝珍18岁的大儿子突然不知去向,李宝珍急得吐血,后来是南街的某保长来告诉他,你家公子被东

洋兵征去修炮楼了。李宝珍一口鲜血喷出来,溅红了半堵墙。

有朋友来出主意,说你的壶艺远近闻名,不妨送把壶给黄龙山的日本人,这样你儿子就可以回来了。

一句话提醒了李宝珍。他颤巍巍爬起来,用一根竹节拐杖,将家中所有紫砂茶壶全部打碎。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李宝珍最后的遗嘱非常简短:从今之后,李家后人哪怕讨饭,也不要再做紫砂。

李宝珍死后,家人将他安葬于蜀山东麓的龙窑前。首先,李宝珍的壶,总是送到这里来烧制。这些壶里,不少是传世之作。这座龙窑,最初是成全了李宝珍,最后又收留了李宝珍,应该说他这一生最重要的知音了。



世象
杂谈



图1

今年上海解放63周年纪念日,李金根,这个参加过大鱼山岛抗战、淮海、渡江和解放上海等无数战役的新四军老兵,与他的战友们,在福寿园海港陵园的新四军广场团聚了!

一个老兵的最后一站

宁远

这次重逢,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李老几十年默默无闻清贫度日,家人根本没有能力为他置办一块墓地。但人们怎会忘记他?家乡航头镇的镇政府为愁眉不展的李老家人解决了这个难题。于是,李老在90岁这年,来到了他的最后一站,在新四军广场,以永远挺拔的丰碑,为后人展示,一个老兵的脊梁。

或许,战争的场面太过腥风血雨,经历过的人都不愿再回忆。

我的长辈中有许多军人,有的赫赫有名,有的只是小卒,但不约而同的,他们集体选择了失忆。拿父亲来说,无论我怎么追问,他也不愿细说当年在越南的雨雨纷飞,只轻描淡写提及密林中随时可能蹿出的竹叶青蛇,以及酷热难当的热带气候,永远只有花絮,不见正文。一位舅公根据亲身经历写过一本小说《微山湖女侠》,以我当时一个小姑娘的眼光来看,那穿梭在芦苇荡里的水战,岂止是不危险,简直是浪漫得紧,让人好生向往。

大鱼山岛战役被称为“海上狼牙山之战”。由是,我理解了与李金根并肩作战的韩永康缘何拒绝接受当地政府补给待遇,宁愿继续守着每月500多元的生活费;理解了李金根默默无闻50余年,从不张扬,没向政府提过一次要求,后来终于“出名了”,仍多次坚持:“比起大鱼山岛上牺牲的42名战友,我是幸运的,我很满足了!”“我已经非

常知足,办不办离休没什么区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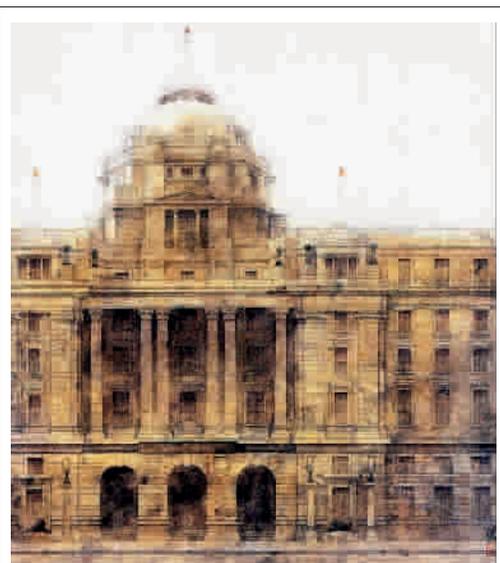
铭记,复原,让烈士传扬千古,无疑是一种可贵可敬的勇气。然而,转身,放下,让一切云淡风轻,又化作岛上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在每年农历七夕这天接受村民缅怀。当年的军歌《海防大队之歌》也流传至今。于是,在宁静的新四军广场上,在肃穆的李金根落葬仪式上,人们的耳边,依稀出现这样一段旋律:“呼呼怒吼的风啊!白浪滔滔的海啊!漂泊在海上啊!海上的英雄打鬼子啊!鱼儿鱼儿安心吧!嗨哟,呼;嗨哟,呼……”

在李金根“出名”后的一次采访中,我看见他把所有铭刻光荣的证书都放在一个用过的食品袋里,随意搁进抽屉。他似乎忘记了大鱼山岛上的激战,几乎不对家人提及,以至于今天他的家人已无法复述李金根的事迹,和他做伴几十年的邻居们更没想到,口中喊了几十年的这个“老革命”真有这么传奇。

然而,大鱼山岛的人们没有忘记他们从海里救起的这个“兵娃子”。75岁的王阿道至今记得父亲如何从海边岩石上救下一个

左手皮开肉绽、口说胡话的血人,靠着香炉灰和稀粥,李金根才死里逃生。

42名烈士葬身大鱼山岛,其中27人是李金根的南汇老乡。如今,他们化作岛上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在每年农历七夕这天接受村民缅怀。当年的军歌《海防大队之歌》也流传至今。于是,在宁静的新四军广场上,在肃穆的李金根落葬仪式上,人们的耳边,依稀出现这样一段旋律:“呼呼怒吼的风啊!白浪滔滔的海啊!漂泊在海上啊!海上的英雄打鬼子啊!鱼儿鱼儿安心吧!嗨哟,呼;嗨哟,呼……”



外滩12号 (中国画) 洪健

“铲子”朋友

任捷

铲子,掘地三尺使久不见光之士见天日。“铲子”,古玩行里的基层工作者,因同具发掘功用而得名。古玩行的货物流通,一靠藏家以藏养藏,二靠“铲子”收藏于民,故此行当由来已久。不熟悉古玩行的人鲜有知道他们存在的,甚至会误把他们当作是收废品的,而废品与古玩,天生价值殊途。“铲子”穿着低调,但具备慧

下丰厚利润空间的漏价转手给藏家或古玩商。在遍地赝品之当下,可以说是他们保留了理论上的捡漏梦想。

曾有铲子朋友穿巷时,见一隅紫砂花盆相叠,攀谈间问主人:“喜摆弄花草,能否送一只铲予我?”主人答:“喜欢都可拿去。”这盆主岂料,是日,其中一只盆就被铲兄以四位数字转手了。

的第一个非刊物奖。上海人在上海拿奖,感觉很亲切,也更受鼓舞。是对我十年写作的一个肯定。自始至终,我都认为自己是幸运的。我不是科班出身,学历也不高,比我优秀的青年写作者肯定还有很多,但他们不见得有我这么好的机会。如果不是碰到了那么好的刊物和那么好的编辑老师,也许我不会有今天。对此,我深怀感激。

今年,文艺社将会出版我的第二个长篇《海上明珠》。依然是写沪上百姓的生活。我会持之以恒地把目光聚焦上海的普通百姓生活,多观察多思考,写出真正能反映当下的有上海味道的上海小说,并为此坚持一生。

一本书要经历多少才能从作者心里到读者手中。

十日谈

书香飘过一甲子

的稿件,窗明几净。那天的情形我一直没有忘记。魏老师问了我的基本情况,工作、家庭,还有创作经历。得知这篇小说是我的处女作,他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说了许多鼓励的话。他劝我坚持写下去。那天是个转折点。如果说之前的写作只是出于兴趣,那么从此以后,我便开始了有意识的写作。一写便是十年。

2006年,我出版了作品集《十朵玫瑰》,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新锐作家文库”中。一共是五名青年作家。我的责编是陈先法老师。陈老师特别和蔼,总是乐呵呵的一张笑脸。他看了我的稿子,第一句便是:“你怎么懂那么多东西啊,好像什么都会写?”我忙回答:“大多都是编的,靠想象的。”陈老师便呵呵笑了。

缘分

滕肖澜

说起来,我的写作生涯,便是从上海文艺出版社开始的。我的处女作《梦里的老鼠》,发表在上海文艺出版社旗下的《小说界》上,而第一部作品集和长篇小说行本,也是由文艺社出版。记得那是2001年的夏天,接到《小说界》副主编魏心宏老师的电话,说小说被录用了,年底刊发,又约我到出版社面谈。这对于刚写作不久的我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好消息。这给了我信心,也让我有了坚持下去的勇气。

第一次去时,因为之前从来没有去过出版社,有些紧张。临走时父亲叮嘱我,到了那里,见人要叫“老师”,别叫“小姐”、“先生”什么的,是行规。我记在心里。上海文艺出版社在闹中取静的绍兴路上,外观是老式的洋房,走进去,肃然而又宁静。来到魏老师的办公室,桌上摆着厚厚



路口相遇,全靠这幸福的红灯。有一次,她书报架上掉下乐谱,我帮她捡起,我们相识了。她是我家对窗的维纳斯,弹一手钢琴,莫扎特的小夜曲,听得我倚窗如痴如醉,她说她也知道我,我常在室内朗诵台词,演员,“艺术界的白领”,羡慕。

我们走近了,艺术本来无界限,心灵上的沟通像冬天里牵来温暖的手,她送我音乐会的票子,我送她看《日出》的戏票,我随方达生。有一次在车上讲讲话,忘了投币,等下了车,才发现手上还攥着钱,我追了上去,车开了,请车上人帮我投一下,回到她身边已气喘吁吁,她笑着说:“憋大,公交公司不欠你这些钱!”

无题

周志俊